

川盐入黔与赤水河流域的社会互动

裴恒涛^{1,2}

(1.遵义师范学院 历史系,贵州 遵义563002;2.中央民族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北京 100081)

摘要:川盐入黔是贵州历史上食盐消费的主要方式。历史上贵州的盐业状况主要受制于以下因素,包括自然因素上贵州地质上缺乏盐产、交通闭塞;社会因素方面贵州地域处于中央集权体制下的边缘地区,以及经济落后、民众购买力低、政府的政策失误等。以赤水河流域仁岸为主体的川盐入黔,带动了赤水河流域经济、交通、文化及民族关系等方面的全面发展。川盐入黔与赤水河流域社会互动的历史,反映了边缘化的贵州不断纳入中央治理范围的历史轨迹。探索这一盐运古道和盐运历史具有一定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关键词:川盐入黔;赤水河流域;社会互动

中图分类号:K291;F12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8580(2012)03-0014-06

盐在人们生活中作用重要,所谓“盐是地球上最普通的商品,但要完整描述它的真正价值,从来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这个星球上,盐是无所不在的精灵。”^[1]但在贵州却是非常稀罕之物,因为贵州不产盐,“黔介滇蜀之中,独不产盐,惟仰给于蜀。来远而价昂,洗金之物与金争价。黔之民有不如西域之驼,桂平之牛者矣。”^[2]其形象地说明了由于贵州不产食盐,川盐入黔是贵州历史上食盐消费的主要方式,贵州民众跋山涉水运川盐入黔的艰辛,以及贵州民众所承受的盐价高昂之苦。造成这种局面的因素是多重复杂的,依笔者浅见,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一、川盐入黔的源起和成因

(一)自然因素的影响

地质上贵州盐产缺乏,地貌上贵州属于边缘山区省份,俗话说“地无三尺平”,群山相连,交通闭塞,潮湿多雨,与外界沟通困难,物流成本高,无疑抬高了盐价,增加了食盐供给的困难。关于贵州及黔北的地理季候特点,学者多有论述,民国学者张其昀在论述遵义的地理位置与环境时指出:“就高原之地势而言,全省

殆为一切割高原,谷岭错纵,崎岖不平,西高而东地,倾斜甚缓,平均海拔一千公尺左右,除娄山高出一千七百公尺外,其余无足以阻凝之山脉,各方气流,得以长驱入境,以本身为互争消长之地,因之天气湿润,其他各省,罕与之匹。”^[3]多山多雨的地形气候条件在科技不甚发达的时代,无疑是当地人与外界沟通的巨大障碍,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贵州当地的交通出行方式以人力或蓄力为主,费时费力,效率低下,史称“本区交通全赖陆路而无水运,区内河流复幼下切,方兴未艾,纵剖面上多急流险滩,即是水量浩淼的乌江,仍乏舟楫之利,陆道亦须逾山越岭,起伏不平,除特别修建之现代公路外,均不克通行车辆,旅客外来多步行或乘肩舆,百货运输,藉人畜背负。故本区交通不等称便。”^[4]这种自然交通条件在没有有效改善的情况下,成为影响川盐入黔数量的重要因素,史料显示“黔省向恃川盐济销,每月所运及配销各县数量均有定额,以途迂道险之故,水陆辗转接远,累月始能到达,且为自然环境及力物力所限,除每月运额盐外,殊无法于额外再行多运。”^[4]

(二)社会条件的限制

明代以前,贵州地域处于中央集权体制下的边缘地

收稿日期:2012-04-08

基金项目:遵义师范学院遵义区域经济研究中心资助项目(ZE201002)

作者简介:裴恒涛(1980-),男,河南宜阳人,副教授,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民族关系史、黔北地方史。

网络出版时间:2012-4-18 网络出版地址:<http://www.cnki.net/kcms/detail/51.1676.C.20120418.1741.001.html>

区,没有纳入到中央的有效控制与治理当中,正如当代学者深刻指出“明以前的贵州是大中国版图中的腹地心脏的边缘,又是中国边疆连接中央王朝的腹地。在政治上游离于‘边’和‘内’之间。”^[12]从明代到民国年间,虽然贵州实现了建省,行政区划逐渐明晰定型,但由于种种原因,其边缘化的现实并未根本改观。贵州地域仍为土司统治,特别是赤水河流域,在明初处于水西土司、播州杨氏土司等的统治之下,后来虽然明代至清朝实行了改土归流,中央对这一地区的政治、军事控制有所加强,但并没有改变这一地区的边缘化趋势^①。如李化龙在其上奏明廷的“请罢开矿疏”中指出:“盖贵州原非省会,止以通滇一线,因开府立镇,强名曰省,其实皆高山峻岭,军民无几,尚不能当他省一大府,有何名焉。”^[13]说明在明代封疆大吏的眼中,贵州的重要性不如云南,其设省的初衷只是在交通上沟通云南,起到一个通道的作用。进一步而言,即对中央政府来说,贵州“只是一个通往云南的通道,贵州建省时并不具备作为一个省级行政区域的主体地位,而仅仅是一个通往已不是要荒之地的要荒之地。”^[14]清末至民国年间又处于地方军阀的统治之下。政治上的这种边缘化趋势导致了贵州长期以来的经济落后,社会闭塞。自然难以有效地统筹解决食盐问题。

(三) 社会贫穷与民众购买力低

由于地理气候条件的限制,长期以来远离中央集权王朝政府的统治核心所造成的边缘化趋势,使贵州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长期落后,经济凋敝,财政困乏,特别是明清以来相当长一段时期,靠周边及内地省份的“协济”度日,正如学者指出:“交通不改良,则未来种种生产建设虽发展,目下本区货物贸易,多赖人挑马驮。运费昂,运力有限,本地产品如剩余粮食,大量木材都难外输。外来之盐布等必需品,多年远道而至,价格数倍于原产地,致本区域贸易屡年入超,经济凋敝。”^[15]大河无水小河干,当地的居民尤其是农村社会购买力普遍低下,清人称:“黔省地瘠民贫,夷多汉少,夷民食盐在可有可无之间,家道稍丰者向商贾买盐以资食用,其穷夷则概食山菜所酿辛酸之物,或曰辣子,或曰酸菜,竟不食盐。黔省夷苗穷困者多,且黔地跬步成山,舟车不通,并无富商大贾,不过穷民谋生,肩挑背负,或羊一二牛马,从川省富顺等处驮盐至本地贩卖,少觅蝇头。”^[16]民国时期,“乡村居民,购买力薄弱,负荷农产薪材入市,购回盐巴一块而外,日用品别无他求。”^[17]综合因素决定下,在其他省份看似不成问题的问题,却成为贵州历史上一重要问题,一严重问题。

(四) 地方政府决策的失当

川盐入黔的困难,贵州下层民众受缺盐、盐价昂

贵,甚至淡食之苦。与历史上贵州地方政府的财政状况及采取的与民争利的不当政策而导致食盐流通不畅有关。明代贵州建省以来,地方财源困乏、财政收入不足,一致是贵州地方官员头疼的问题。周边各省的“协济”(犹如当今中央财政转移支付)是历史上贵州地方政府运行的重要保障之一,但往往是远水解不了近渴,战乱年代,财政上更是朝不保夕。贵州地方官员也千方百计的开发经济,扩大税源。特别是民国军阀统治贵州时期,地方军阀为了扩大势力,招兵买马,财政开支浩繁,而地方财力有限,就想法设法寻求生财之道,鸦片税和盐税是其中重要财源。为了扩大盐税收入,当时的黔政府垄断川盐运销,不顾省情民意,改革盐法,采取“各案专商”大商人的政策,所谓“则法愈繁而弊愈滋,事愈繁而争愈大”^[18],导致食盐流通受阻,盐价昂贵,损害了川盐产地盐厂及贵州民众的利益。这引起了当时有识之士的忧虑,甚至受到四川盐政官员的干预,如民国时期《川盐特刊》数次刊布各界要求贵州省政府取消各案专商以恢复自由贩运的函件。民国18年(1929)8月的“盐运使署函请贵州省政府将各岸专商予以取消恢复自由贩运以符盐法案”即指出了这种弊政的危害,指出:“行销边地之盐,往系该地贫苦农民于农隙之时,肩挑背负以运行,每盐一张,约需足夫七十余名,以年销二千余引之盐,约需劳工十数万人,该足夫又以所得力资,在永购买零盐,以作带手,多至十斤,少则六七斤不等,此项带手,每年计达百引,足夫亦得同沾余利,兼可接济民,自该专商成立,挟黔府势力,进口称吊,不准带手,甚至于劳工足资,故意克扣减少,如遇盐边需盐之时,该专商增高盐价,措抑不运,近月人民嗟可如何,其对运商,则低价措买,百般刁难……若不取缔专商,则运商终难自由,妨碍国税民食,商业劳工。”^[19]时人更直言不讳指出导致黔盐价昂的根源在于贵州当局的食盐重税政策,“其咎在黔不在川,而根本上川盐并不重税,而重税者亦在黔省政府……川省每年行销黔省之盐曰五百余载,黔省政府即包政商人一百五十万元,没包已值五元之矩,大商又转包小商,藉次垄断,层层剥削,倍于正供!近日复闻又有每包加征三元之事,则每盐一包,黔省政府已政取十五六元!超出川税几倍以上。且川省盐本运费以及税收各项,综合核价至多不过售洋一角,在黔省盐商每斤售至五六角之多!以此种种事实,相提并论,则实行恶税者黔省政府也,重累黔民者亦黔政府也。”^[20]该评论还指出了黔省官商勾结,谋取盐利,抬高盐价的事实,“且以仁边岸而论,川盐仁岸销场,历由黔省盐商就合江向川商自由购买盐载,自前年(1928年)黔省政府招商保税后,黔包商遂得以操纵垄

断,对川商则贱价措买,对黔省食民则高价短销,每盐一载黔包商有获利至四五千元之多者,黔民有贵价淡食之苦,川盐则因积滞陷于不可生存地位。”^[1]

二、川盐入黔的路线

四川自贡地区自古以来是我国的重要的井盐产

表 1 川盐入黔情况一览表

销岸	配厂	盐别	行销路线	行销区域		清代管理机构	民国验收汇缴运照机关
				四川省	贵州省		
仁边岸	富荣	火白巴盐、炭黑巴盐	由自流井经合江转江 ^③ 自仁怀厅(今赤水市)、猿猴(元厚)、土城到仁怀之茅台村		仁怀厅,遵义、大定、贵阳各府	仁岸分局	合江督销局
綦边岸	富荣	火白巴盐	由重庆江津之江口转江自綦江,经桐梓之新站入黔	綦江、南川两县	遵义、贵阳、都匀各府,平越府	綦岸分局	綦江查验局
涪边岸	富荣、糖厂	火白花盐、火白巴盐、炭黑巴盐、火草白巴盐、青口炭巴盐	由涪转江自酉阳之龚滩入黔	酉阳、秀山、黔江、彭水各县	思南、思州、镇远、石阡、铜仁各府,松桃厅	涪岸分局	涪陵督销局
永边岸	富荣、糖厂	炭黑巴盐、青口炭巴、白口炭巴	由纳谿转江自叙永入黔,溯赤水河至大定、安顺等地	叙永、古宋、古蔺等县	大定、安顺、兴义各府,普安厅	永岸分局	叙永督销局

注:此表根据民国林振翰编《川盐纪要》,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8年(1919)第236-237页,281-282页及贵州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贵州省志·商业志》,1990年版第573页;丁宝楨《四川盐法志》(续修四库全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卷10,第201页,209-212页等资料数据综合而成。

其中以赤水河为主体,以赤水河畔的赤水、习水、仁怀为重要接点的仁岸,为川盐入黔的最重要口岸,明清以来,经仁岸运往贵州的食盐占据大宗。特别是清末民初,仁岸食盐运销贵州大部分地区,如贵阳府、思南府、安顺府、兴义府、都匀府、平越直隶州、石阡府、大定府,以及遵义府所属遵义、桐梓、绥阳、正安五县和赤水厅。“仁岸”川盐入黔的路线是沿着赤水河逆流而上,全程共分七段。第一段:川盐由四川省的自流井用小船运到邓井关,再运到赤水;第二段:从赤水市沿赤水河运到元厚站;第三段:从元厚站运到土城站;第四段:从土城站运到二郎滩站;第五段:从二郎滩站运到马桑坪;第六段:从马桑坪到茅台村;第七段:从茅台站陆路起运,分两路:一路经石子坝、两路口、坛厂、长岗、枫香坝到鸭溪。另一路经梅子凹、盐津河、鲁班场、五马、岩孔到金沙、大定等地(见图1)。

在主要依赖人力的传统交通时代,在崇山峻岭阻隔的川黔之间,水运无疑是最经济的货运方式,因为,川盐入黔自然地与赤水河形成了不解之缘,如前所言川盐入黔以赤水河为主要通道,而川盐入黔过程本身又有力地推动了赤水河流域的经济、交通、文化的开发。同时,以仁岸为主体的川盐入黔凝结了贵州人的鲜血和汗水,表现了贵州人在严酷的自然条件面前的不屈的抗争精神,川盐入黔史谱写了贵州特别是黔北民众可歌可泣的悲壮历史画卷。

地。由于贵州特别是黔北地区与四川地理和行政上的接近,川盐入黔是贵州食盐消费的主要渠道和形式^②。从明代以来,在历代中央及地方政府的干预下,川盐入黔主要形成了四大口岸,即仁、綦、涪、永四大口岸,具体参见表1。



图 1 赤水河流域仁岸、永岸川盐入黔线路示意图

注:该图根据现代贵州省行政区划图、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册》清代贵州地图及《仁怀县文史资料》第9辑袁廷尧《仁怀盐运述略》资料绘制而成,其中点状线路表示仁岸,直线路线表示永岸。

三、川盐入黔与赤水河流域的社会互动

(一)经济方面

川盐入黔使使得赤水河流域的城镇活跃起来,仁岸盐运沿途,为了满足过往商贾、运盐人员和驮马食宿生活需要,纷纷开设旅栈、饭馆、食店、马店及各种商品销售店铺。赤水河盐道沿途人民不仅在食盐方面得到

需求的便利,而且开始寻求商机,“食盐之路”上兴起了一批充满活力的商业市镇。川盐入黔直接带动了赤水河畔仁怀的酿造业、旅栈服务业、造船业、商业、邮电业、金融业等行业的兴起,所谓“仁怀商以通而力裕”^[12]。可以说,仁怀今天能够形成中国酒都的地位,与川盐入黔的影响是分不开的。所谓“茅台镇因盐而兴旺,积聚了大批盐商。这些盐局不少是陕西、山西籍的商人,人称‘老陕’。清代著名诗人郑珍道光二十三年(1843)有‘蜀盐去贵州,秦商聚茅台’的诗句。……仁岸著名的四大盐号:‘永隆裕’、‘永发详’、‘协兴隆’、‘义盛隆’在茅台村羊叉街竞相建仓筑舍,以至鳞次栉比,当地人称之为盐苍街。”^[13]除了茅台镇之外,因川盐入黔兴起的市镇还有打鼓、永兴、团溪和赤水等。打鼓镇就是后来的金沙县,其位于赤水河的中游,打鼓又称打鼓新场,相传过去在这一带赶集时,要分别在打鼓寨与红岩桥头各置鼓架,击鼓为号方能进入市场,因此而得名。所谓“每旬三、六、九赶场,击鼓为号,故称。”^[14]由于处在川盐入黔的重要通道上,打鼓镇到清末民初得到了迅速发展,这里逐渐成为湖南、四川两省布匹、烟、酒、糖、丝绸销售的市场,同时又作为境内山货、药材等土特产品销往外地的主要集散地。与川盐运销直接相关的一些产业更是应运而生,如驮马、铁匠、木匠、棕匠、草鞋匠等行业等到发展,带动了整个城镇日益活跃起来。此外,川盐入黔重要的口岸、位于赤水河下游河畔的赤水,民国时期发展成为贵州重要港口城市及西北门户。这里自清代以来便是贵州主要盐港,民国时期更是占据川盐入黔的半壁江山,据资料显示,1925年“赤水县所征盐务附件税占贵州全省各统税局所征盐务附加税总和的45%”^[15],表明赤水河仁岸盐运地位的重要,其直接给地方政府增加巨大税收,成为沿岸城镇发展的有力推手。当时,来自下游的舵船与上河的梢船在此换载,这里“港口装卸搬运愈繁,港区盐船百余艘,总载量2000余吨,年吞吐量达二三万吨,为全省之冠。”^[16]

(二)交通方面

以仁岸为主体的川盐入黔有力地推动了赤水河航运业及川黔交通的发展。赤水河为长江上游支流,汉代称大涉水,晋以后称安乐水,唐代称赤虺河,后来逐渐称赤水河,在云、贵、川三省接壤地区。赤水河发源于云南省镇雄县,上游称鱼洞,东流至川、滇、黔三省交界处的梯子岩,水量增大,称毕数河,经贵州省赤水市至四川省合江县入长江。全长523公里,流域面积约2.04万平方公里。两岸陡峭、多险滩急流。其航运条件并不理想,特别是川盐入黔,是逆流而上,运输起来相当困难。为了改善川盐入黔的运输条件,明代以来的历代政

府都非常重视对赤水河的治理,重点是改善航运条件。如清代乾隆时期贵州总督张光泗为了改善川盐入黔的条件,同时也为了滇黔铜黔物资的输出,在其倡导与主持下,赤水河中上游河道得到了一次整治。“此期工程上起毕节县境内的天鼓岩,下至猿猴附近的鸡心滩,纵长400余里。乾隆十年十月初一动工,次年闰三月初一竣工,共整治滩险68处,耗银38642.5两……新增通航里程300余里。”^[15]之后,赤水河的河道屡有修整。清光绪时,四川总督丁宝桢改革贵州盐务,其中一项重要的措施就是设立江河维护局,专门负责打险滩、修路。民国时期,主要完成了川黔干线公路的修筑与改善。根据民国史籍记载该路的情况是:“黔川路位于本省北部,自贵阳起经息烽、乌江、遵义、桐梓、松坎、至黔川交界之崇溪河,由贵阳至桐梓一段,于十九年(1930)完成,桐梓至崇溪河一段,因工程浩大,历经几年,仍未成功;至二十四年经中央拨款补助,始完成通车,但全线地势险峻,山岭重叠,修筑多不合标准……先后经中央拨款交由本省建设厅设置工程处整理;至卅五年(1946)底,始可通行车辆,但乌江河宽一百五十公尺,虽两岸设置码头,打造渡船四双,因水流太急,过渡仍极费时。”^[16]

(三)文化方面

川盐入黔,加强了巴蜀文化与贵州文化的交流与融合,进一步丰富了黔北文化。千年的川盐入黔的历史时期留下了许多反映盐运民工艰辛的文艺作品,包括脍炙人口的诗歌《茅台村》、《背盐歌》、《拉船歌》,朴实自然、寓意深刻的小说作品《盐灾》等等。其中,反映川盐入黔与美酒的如郑珍《茅台村》:“远游临郡裔,古聚缀坡陀。酒冠黔人国,盐登赤虺河。迎秋巴雨暗,对岸蜀山多。上水无舟到,羁愁两日过。”反映黔北背盐艰辛状况的叙事诗歌如《背盐歌》,其词曰:“盐巴佬二一碗米,半夜三更就漕起。背子上背就起身,七齣八喘拢茅村。靠起背子放过哨,歇口气又起路程。拢了坛厂望长岗,坛长垭口坡好长。上坡出气搞不赢,拄扒载在屁股上。到了长岗歇过夜,背上生起盐水疮。通痒通痒睡不着,睁眼一晚抠到亮。鸡叫三遍催人起,背着背子望枫香。枫香坝去歇口气,过称交差在紫溪。紫溪过称盐不差,领起工资转回家。白天夜晚把路赶,腿发麻来眼发花。一步跨进家门口,破年儿女敬菩萨。一柱香敬‘背垫’,二柱香来敬‘拄扒’。背垫拄扒都是神,保佑我爹背盐巴。一听叫人心头辣,想拉几句家常话。只望娃娃有出息,长大莫去背盐巴。”^[17]某些诗作反映了黔北妇女背盐的艰辛情状,如《二郎滩咏负盐女》写道:“脂粉不曾添额际,黛痕从未上眉尖。生来隐为花神弃,瓜字平平尚负盐。峰回路转低石高,汗浸襦衫颊晕潮。多少韶华

多少恨,几曾消受沈郎腰。钩藏莲瓣石油碓,负重行艰欲断魂。那有浣纱津上事,风神凄绝苾罗村。息肩斜坐逞莺声,絮语迎风残莫惊。阿妹十三依十六,朝朝离枕听鸡鸣。”^[18]反映历史上贵州盐价昂贵、百姓吃盐困难的民间歌谣如:“斗米难换一斤盐,想吃咸点等过年。索索掉起添一天,娃娃哭得泪涟涟。”“河东王,河西李,还有胡爷与秦堂。要吃盐,找胡爷,无钱去找河东王。”^[19]《盐灾》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黔北乡土作家蹇先艾创作的小说,其真实的反映了缺盐的贵州,在民国军阀统治时期的食盐专卖制度下,盐商与官员勾结抬高盐价,造成百姓吃不起盐、淡食成病的“盐灾”局面,小说中描写到:“红沙沟最近闹起盐灾来,农民们谈食已经一个多月了。今天我下坡去,在村子里走走,我所遇到的每一个人,面貌都非常黑,没有一点笑容,像丧失了什么人一样,不说话,低着头,托着鞋,不扣衣服,无目的的乱走。”^[20]字字血泪,读来让人心酸。此外,川盐入黔、缺盐少盐的历史记忆对贵州的民族民俗文化产生了一定影响,如“贵州侗族青年定情后,男方要请一位熟识的老奶奶去女家说媒,征求姑娘父母的同意。媒人说媒所带的礼物很简单,是用一片棕叶包着两样东西,半斤盐巴和二两茶叶。如果女家不收这份礼,退还媒人,则表示女家不同意订婚。”^[21]当前黔北遵义的地方政府大力弘扬红色文化,美酒文化,把独具特色的地方文化作为树立地方形象,推动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措施之一。这其中,川盐入黔所凝结的盐运遗迹及其文化也是重要的亮点,应有所珍视。

(四)民族关系方面

包括赤水河流域在内贵州作为传统的民族地区,彝族、仡佬族、苗族等少数民族在这一地域存续的时间悠久,历史曾占据很大比重,志书称明代的贵州“诸夷环列如故”^[22],而赤水卫则是:“讼简盗稀,生计萧条,境皆夷。”^[23]随着千百年的川盐入黔,特别是川盐产地自贡等地的食盐生产对人力的吸收,盐运古道上人员的流动,重要口岸上盐号的建立,所引起的移民与文化交流,影响了黔北民族关系的格局。一方面是贵州各族底层民众为生计所迫,加入川盐入黔的运输队伍之中,彼此加强了沟通与融合。清朝末期贵州多数地区非汉人族群分布广泛,社会发展落后,食盐消费困难,“至贵阳为省会,民间食盐,较之别府虽多,惟是夷多汉少,无力买着过半。”^[24]民国时期赤水河流域的大方瓢儿井一代的仡佬人,许多为生计充当了川盐入黔的背盐伕,他们与周边各族社会低层的民众一样承担了传统时代盐运的艰辛,志书记载其艰辛情状:“幼者十二三,老者五六十,无不以负盐为业也,数步而肩换,三里而息喘,日食

玉蜀黍之爆花,昔眠粗白菅之短席,一生无被,终岁衣缕,头裹布巾,足惟草履,夏炙日,冬履霜,徒岭穿林,冲风冒雨,一染寒痂,比户不休。”^[25]另一方面,随着川盐入黔刺激下赤水河流域古城镇的发展,北方省份及湖广江西等省区的汉族商人,在丰厚利润的刺激下,纷至沓来,所谓“蜀盐走贵州,秦商聚茅台”,他们在赤水河流域各盐运古镇或开设盐庄,或者经营客棧,或者流动贩卖营销商业物资,这些人在当地定居生存,扩大移民成分的同时也影响了当地的文化。于是,内地的儒家文化、商业文化在此广为传播,使得黔北的汉人群体进一步扩大,“夷多汉少”的格局在明清时期被逐渐打破,汉人成为黔北的主流民族群体。正如学者指出:“‘川盐古道’的亘古与持久,不仅对中国内陆各民族的生存发展起着重要作用,也给我们在研究不同地域之间民居演变、构筑方式、聚落成因以及文化的相互作用与影响等问题时提供了一条明确而清晰的线索。”^[22]

四、讨论与结语

川盐入黔与赤水河流域的社会发展及两者间相互作用的历史,实际上反映了作为边缘化的贵州不断纳入中央治理范围的历史轨迹。从明代以来到民国军阀统治时期,贵州整体上处于中央集权统治的视阈之外,地处黔西北的赤水河流域更是边缘之中的边缘。此外,这一地区多山交通不便的状况又加剧其与外界的联系。中央政府多从军事控制的角度加强这一地区的道路建设,而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盐道建设严重滞后。民国以来,国民政府实现了对包括赤水河流域在内的贵州地域的直接行政管辖,再加上日后贵州作为抗战的大后方,贵州的经济交通建设日益成为政府的重要任务。现代交通体系不断完善,贵州的边缘化状况逐渐改观,川盐入黔方式逐步实现了现代化。同时其他地方的食盐也不断通过多种路径进入贵州,彻底改变了贵州人民吃盐困难的局面。

随着赤水河流域各城市新的经济增长点的出现,上游毕节地区的煤炭业,中游的酒业、下游的林竹业、化工等产业初具规模,人们多半已经淡忘了那段历史;昔日的盐运古道成了历史陈迹,成了沿岸古老村镇人饭后的谈资。但是川盐入黔曾经带给赤水河的社会发展基础是不应被遗忘的。特别是那种精神层面的财富,更是今天赤水河流域经济社会发展所必需。因为,与东部及沿海地区相比,赤水河所处的边远位置,相对封闭落后的交通运输条件,其整体经济实力等,仍使其处于落后地区,差距较大。随着区域经济竞争的加

大,随着人口发展需求与生态环境承载力的矛盾凸显,给当地人以新的发展压力和时代课题。如何利用这些川盐古道上的历史遗迹,如何以川盐入黔盐运文化为基础,加强赤水河流域川滇黔渝省区的协作与开发,这是我们应该认真思考的问题。

注释:

①特别是赤水河上游的黔西北的毕节地区,明清时代作为“蛮夷”地区,土司统治时间较长,中央王朝对这一地区的统治与教化经历了相当长的一段时期。相关内容参见温春来《从“异域”到“旧疆”:宋至清贵州西北部地区的制度、开发与认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

②除了行政、地理上的因素之外,历史上贵州主要选择川盐应与川盐及滇盐的品质有关,根据早年日本学者的田野人类学调查,当地人认为“川盐成块状,含碘,无害。滇盐成粉状,缺碘,食用后甲状腺肿大。”参见[日]冢本学《盐巴的供求关系》,[日]坪井洋文编,黄才贵译《彝族的社会和文化——访问贵州省西北地区的少数民族》,贵阳:贵州大学出版社,2011,第65页。

③转江是川盐入黔过程中的一个技术术语,指运盐船只经过长江与其支流的交汇口时,需要换船以适应支流河道的航行。参见丁宝楨《四川盐法志》卷10,第201页,“其盐入四岸:旧制由大江至此,换船溯流折岸河,曰转江。永岸由纳谿转江自叙永入黔;仁岸由合江转江自仁怀厅入黔;碁岸由江津之江口转江自碁江入黔;涪岸由涪转江自酉阳之龚滩入黔。”

参考文献:

- [1] 王仁湘,张征雁.中国滋味:盐与文明[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7:305,113,193.
- [2] 张澍.续黔书(中国方志丛书)[M].台北:成文出版社印行,1967:136.
- [3] 张其昀.遵义新志[M].国立浙江大学史地研究所,1948:33,151,155,118.

- [4] 江凤簏.国民政府时期的盐政史料:1926—1947[M].台北:国史馆印行,1993:126.
- [5] 张幼琪,史继忠,王寄幸子.贵州:开发引出的考量[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8:10.
- [6] 李化龙.平播全书(畿辅丛书二编)[Z].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藏线装原刻本:161.
- [7] 杨昌儒,孙兆霞,金燕.贵州:民族关系的构建[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10:56.
- [8] 丁宝楨,等,撰修.四川盐法志[M]//《续修四库全书》编辑委员会编.续修四库全书,八四二·史部·政书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191.
- [9] 论川盐之前因后果[J].川盐特刊,1929,(69):2.
- [10] 盐运使署函请贵州省政府将各案专商予以取消,恢复自由贩运以符盐法案[J].川盐特刊,1929,(69):4-5.
- [11] 曾穉松.川黔争执与重税[J].川盐特刊,1930,(139):5,9.
- [12] 爱必达.黔南识略[M].台北:成文出版社,1968:10.
- [13] 王强.贵州商业古镇茅台[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6:16.
- [14] 谭智勇.千里赤水河行[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76.
- [15] 夏鹤鸣,廖国平.贵州航运史:古、近代部分[M].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1993:156,180,108-109.
- [16] 何辑五.十年来贵州经济建设[M].南京:南京印书馆,1947:11.
- [17] 母光信.川盐入黔与仁怀的经济文化[C]//政协贵州仁怀市委员会学习文史委编.仁怀文史资料.1996,(13):117-127.
- [18] 罗剑僧.罗剑僧遗诗[C]//政协贵州仁怀市委员会学习文史委编.仁怀文史资料.1999,(16):170.
- [19] 蹇先艾.盐灾[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1:6-7.
- [20] (嘉靖)贵州通志[Z].谢东山,修,张道,纂.嘉靖三十四年刻本:195,272.
- [21] 任可澄,杨恩元.(民国)贵州通志[M].贵阳:贵阳书局,1948:109.
- [22] 赵逵.川盐古道——文化线路视野中的聚落与建筑[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8:4.

责任编辑:梁雁

“Sell Salt from Sichuan to Guizhou” and the Social Interaction along Chishui River Valley

PEI Hengtao^{1,2}

(1. History Department, Zunyi Normal College, Zunyi 563002; 2. 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 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081, China)

Abstract: “Sell salt from Sichuan to Guizhou” was one of the main ways of consuming salt in the history of Guizhou Province. Guizhou’s salt industry in the past was constrained by both the natural factor of salt shortage and traffic inconvenience and the social factors of backward economy, low purchasing power and so on. “Buy salt from Sichuan” had greatly improve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ociety, culture, economy, and ethnic relations along Chishui River Valley. The interaction history caused by the case reflects that the remote Guizhou is constantly coming into the management range of central government. It will have a certain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o research the historical case.

Key words: sell salt from Sichuan to Guizhou; Chishui River Valley; social interaction